

本所藏

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的來歷與整理



本所拓片（局部）



漢武梁祠畫像

沙畹本（1893・局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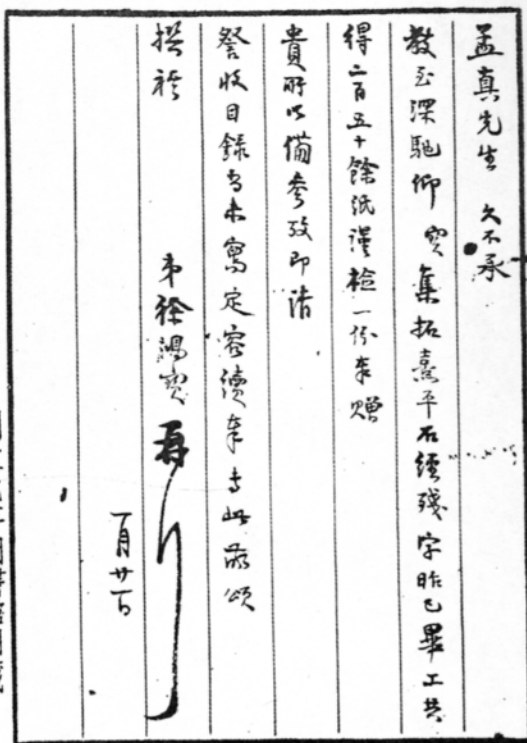
邢義田

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）

民國十七年，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。第二年八月，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，由朱希祖任籌委會委員長，傅斯年、陳寅恪、李濟、裘善元、董作賓、徐中舒為委員，開始蒐求各種金石文物。

當時藏品來源甚為複雜，以贈送、交換、自行椎拓和購買四途為主。據可考的檔案資料，民國十九年六月本所曾獲北平故宮博物院贈送帝后像、印譜、拓片廿四件，又得散盤、嘉量二器拓片四種（史語所檔元294-8、10、11；以下僅標檔案編號）。同年八月故宮與我所建立拓片等藏品及出版品交換之約（元294-12）；十二月史語所即依約以所藏銅器、石刻拓片一全份回贈故宮（元294-14、15）。此為交換之例。廿年一月廿一日，徐鴻寶先生曾贈送史語所其所集拓熹平石經殘字二百五十餘紙（元370-7-136，附圖一）。廿一年七月，徐中舒先生到上海訪善齋劉體智（晦之）先生，劉先生遂贈史語所善齋藏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種，又拓片一百餘紙（元370-7-6）。民國卅年，黃旭初贈傅斯年顏真卿題「逍遙樓」榜書拓本、平蠻三將題名、元祐黨籍碑、曾公嚴題記拓本，傅先生又轉贈史語所。此為獲贈之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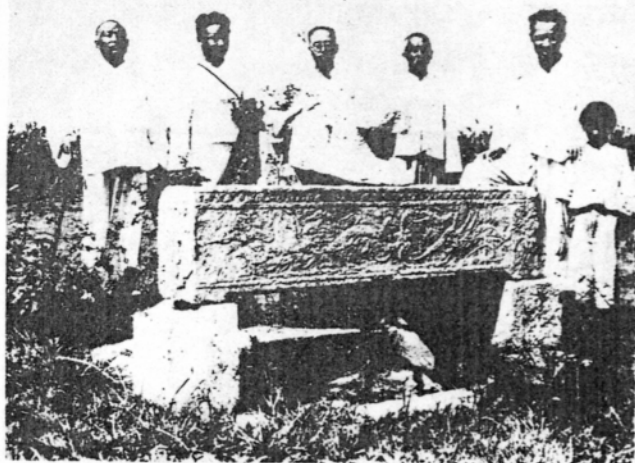
史語所研究人員也自行椎拓。民國廿二年七月，董作賓先生原擬往山東滕縣安上村調查當地發現的銅器，奈何阻於土匪，只好在縣城附近調查漢畫，得拓片數十幅。此外在發掘滕縣曹王墓時，得到不少碎畫象石及王獻唐所贈此墓畫象拓片。^①同年八月，董先生轉往河南南陽草店調查漢墓畫象，發現畫像二十石，三十四幅（附圖二）。石璋如先生編《考古年表》又謂「其餘城鄉散存畫石亦甚多」。^②在傅斯年圖書館保存的一張由重慶沙坪壩（寄件人不詳）寄昆明靛花巷史語所的牛皮郵包紙上，曾註記南陽畫象138幅的出土地：五中學校、阮堂廟、栗河橋、新店鎮、城東泰山廟、南河廟、鄂城寺、石橋鎮、江黃村、百里頭墓等。其中新店、南河、石橋尚可在現今地圖南陽附近找到，這些應皆在所謂的「其餘城鄉」之列，也是董先生曾蒐羅過畫象



圖一 徐鴻寶致傅斯年函（民國廿年元月廿一日）

① 見董作賓，〈山東滕縣曹王墓漢畫象殘石〉，《大陸雜誌》21.12（1960），封面及頁6、11、28。

② 石璋如編，《考古年表》（1952），頁3。



圖二 董作賓先生（左起第二人）在河南南陽調查漢畫象石。
採自《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》，民國五十五年，藝文印書館。

調查南陽漢畫像：

的地點。本所現藏滕縣、南陽畫象頗有出於一般著錄之外者，當由此而來。此為自行椎拓之例。民國廿八年，本所曾與北平圖書館合作椎拓昆明左近漢魏至宋元碑銘。合作辦法是北平圖書館任椎拓之事，我所出資購買（昆7-115～121）。

價購的來源有書商，圖書館，也有個人。民國廿年二月二日，馬衡因聽說琉璃廠有薛尚功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末卷求售，索價六百，特致傅斯年一信謂「薛書拓本見存者多數皆歸貴所。此卷雖係石鼓，與鐘鼎無關，究係首尾完全之一卷，且可與流出東鄰之三宋拓石鼓相參證，貴所收之，最為相宜。不審兄有意乎？」傅先生於信末親作注記「已電之代購」（元314-2-1）。另從徐中舒留給傅斯年的一便條（元325-7，附圖三）可知，當時傅先生還曾請徐中舒及趙萬里代為鑑定，並討價還價。徐氏便條云：

薛氏鐘鼎法帖讓價三百四十元，須早日付款，愈早愈好。今日取所藏三殘片對看，前後互相銜接，墨色紙張亦無稍異，斷是「一個本子」。趙斐雲（按：萬里）說此為棗木板，似不可靠。觀其破損處，全無木紋。蓋拓墨法經過千年，定有許多改革，不能以今之拓法斷定此本墨色非石拓，不知以為如何？ 留上

孟真先生

弟中舒

傅先生後來接受徐氏的建議，買下法帖。信中所謂「三殘片」是指民國十八年史語所在內閣大庫檔中所得之宋拓殘頁，^③後與新獲之十六頁合而於民國廿一年影印百部行世。這是本所購藏薛尚功《法帖》殘本經過的點滴。又廿年九月山東省立圖書館擬拓濰縣高鴻裁（翰生）藏磚瓦，即《上陶室磚瓦文攷》十二冊，預售一百一十一元。史語所很快即匯錢訂購一部（元310-5-2、3、16）。此為購自圖書館之一例。廿一年十月十五日有名沈維鈞者，以個人藏宋天文圖、地理圖、宋刻帝王紹統圖和宋平江圖舊拓要求交換史語所出版之《秦漢金文錄》和《敦煌劫餘錄》。時任史語所秘書的徐中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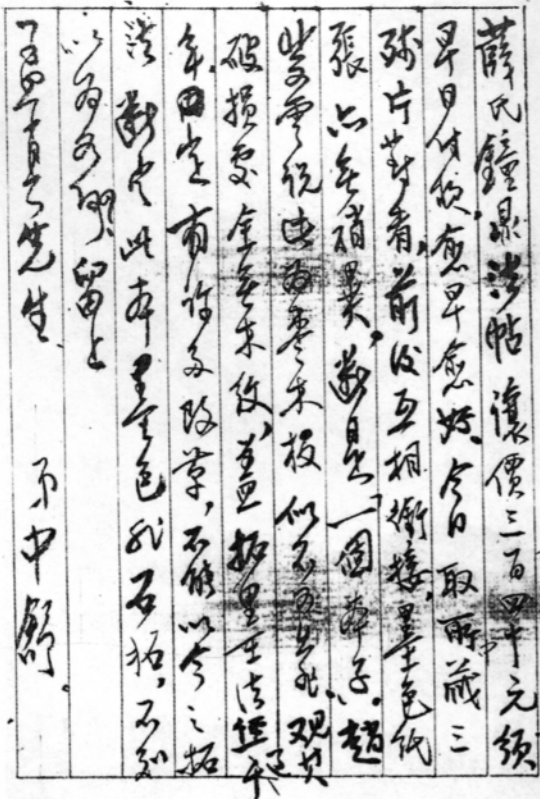
③ 見徐中舒，〈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〉《史語所集刊》2.2(1930): 161-170；〈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2.4(1932): 468-470。

十月十九日迅即代決，復信同意交換（元358-3、5）。此得之於個人藏品之一例。傅斯年亦曾函容庚代為蒐購拓片。容氏介紹孫壯（伯恒、雪園）藏品，似因價格不合，傅未回信，容氏為之一再催問（元74-15~17）。

當時蒐求文物金石善本之事，由傅斯年先生主其事。協助他的主要有徐中舒、余遜、徐鴻寶、裘善元、趙萬里等先生。勞榘也曾參與其事。勞先生回憶說：

在搜購時，係傅孟真先生親自參與。當書商攜拓片到所的時候，我也時常被邀去看，甚至有時傅先生外出，有些書商來找我，然後轉達傅先生。（82.3.9

勞先生致作者函）



圖三 徐中舒致傅斯年函（民國廿年，月日不詳）

在一封年代不明，余遜致傅斯年的信中曾提到「貞一兄昨寄來石刻目一紙，囑照單購買。生近數日方整理帳目，俟帳單寄出後，即當招碑估來送拓本，議價值也」（元37-1）。這當是勞先生代傅先生傳旨，余因而回覆傅先生。

北平琉璃廠的書商可以說是本所拓片最主要的來源。他們向全國各地舊藏家收購，再轉售我所。本所檔案中有不少商購拓片的往來函件。例如北平古光閣曾函傅先生，擬售孫壯藏三代秦漢陶器磚瓦封泥等拓片二百十七品，傅先生在信末親批「買一份」（元309-3，附圖四）。可惜此信年代難以確定。有往來記錄可考的碑估還有經古舍文玩法帖莊、翰茂齋等。民國廿三年十二月曾向經古舍購拓本三十六種，價洋三十九元，清單及付款收條俱在。翰茂齋則曾一次售本所拓片七十張。

從十八、九年至廿六年抗戰爆發前夕，短短七八年間，本所即建立了頗為豐富的收藏。勞榘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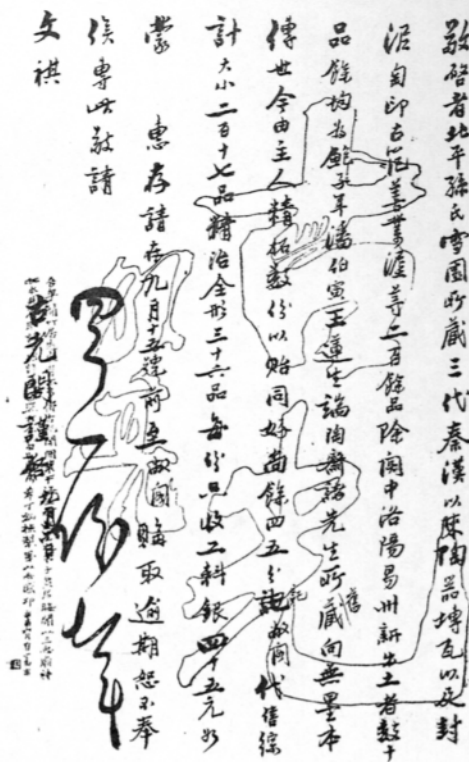
就拓片來說，自以北京大學所藏的「藝風堂」收藏為全國最多的。本所儘量收購，已有一部分超過「藝風堂」之外。……而漢畫則不少出於藝風堂之外。尤其是藝風堂收藏到清末為止，而本所收藏到對日抗戰以前，則為藝風堂所未收到。漢畫中如武梁祠、孝堂山、南陽石刻，以及畫像碑均有出版（畫像碑出版過，當然收集不全）。武梁祠最好的是沙畹所印的，大概可能到康熙。我們所

藏是乾隆拓本，較日本及燕大所印為好。燕大的並且印的不全。其他的最好為滕縣畫像，是除朱鮪石刻（明帝時）以外，一個最早石刻（有一銘記指明為章和時代）。我過去作的「六牙象」即是據此石刻，非常值得整理出版。嘉祥石刻是一般「武梁祠」所未收，亦值得考慮出版。再就是四川畫碑。至於鄭州石刻，現在記不清了。如未曾出版，想亦可整理出版。總之，在本所藏的漢畫確甚豐富。（82.3.9.勞先生致作者函）

勞先生當年釋讀居延漢簡完畢，曾受傅斯年之命，在北大校讀藝風堂碑（元6-5，勞致傅函）。繆荃孫藝風堂藏拓以豐富精審著名，民國十二年歸於北大國學研究所。因此勞信中不免以藝風堂與本所藏品比較，並盼整理出版。今天漢畫拓片能有目錄及精選集出版，想必是勞先生所樂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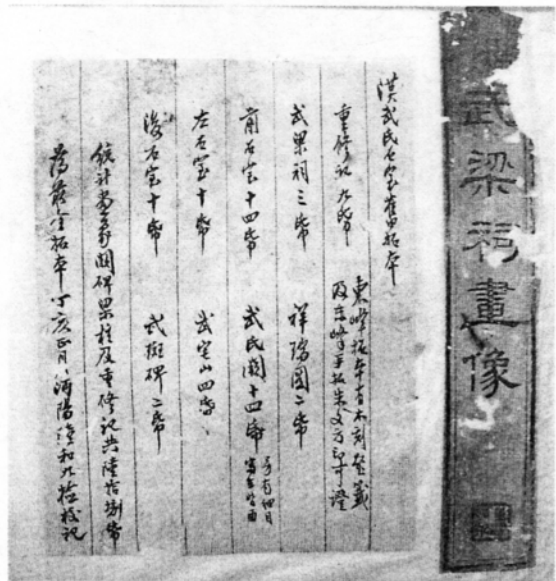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進一步了解本所相關藏品的精麤真偽，民國八十六年我又曾修書請教勞先生。勞先生在回信中提供了若干畫象來源的消息，也說明了他對真偽的判斷：

大致漢畫出土各地相當多，取得拓本亦甚易，若偽造漢畫成本極高，而且亦難盡如原作，故墓志或偶有偽作，而漢畫則從無偽本，只有拓工精確與否以及拓本時代先後。譬如武梁祠從乾隆本、光緒本以及民國本，其清晰程度即大不同，而價值亦自迥異。……武梁祠拓本全屬真物，絕無偽託。只其中不少應分為兩部分。其中一部分為北京某賞鑒家（好像姓陸）所藏（其名氏在原包裝上，現在記不得了）。另一部分為本所另外購買者。某氏原藏者較舊，另外購買者較新。至於弟所題字者為其中某一部分，現在已無從記憶。不過從前弟確曾用本所所藏的武梁祠刻石與通行各本一一校過。其中以沙畹所印的為最好。與本所所藏各有短長，只是沙畹本更好些。其他如日本所印以及國內所印都相差很多。（86.5.20.勞先生致作者函）



圖四 古光閣致史語所函

勞先生親自參加蒐購，又曾利用藏拓寫過論文，是了解本所收藏的前輩之一。數十年後的回憶雖不免有些出入，^④卻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線索。勞先生提到陸姓賞鑒家，證明就是金石名家陸開鈞（和九）。我很幸運在圖書館找到原包裝武梁祠畫象拓片的青布硬殼封匣。封匣裡有陸氏墨筆親書的校記。這青布硬殼封匣應即勞先生所說其名氏所在的「原包裝」。校記實為一拓片目錄，以另紙黏貼在封套裡。其文云（見左圖）：



漢武氏石室舊拓本

重修記九紙	東峰拓本有木刻題籤 乃東峰手拓，朱文方印可證
武梁祠三紙	祥瑞圖二紙
前石室十四紙	武氏闕十四紙 另有細目 寫在背面

左石室十紙	武宅山四紙
後石室十紙	武斑碑二紙

總計畫象闕碑梁柱及重修記共陸拾捌紙

為最全拓本 丁亥（按：光緒十三年，1887）正月沔陽陸和九檢校記

東峰當為著名拓手，封面題籤上如陸氏所說確有「東峰手拓」四字朱印。東峰為何人，猶待查考。陸氏於光緒十三年檢校，並名之為「舊拓本」，可知這批拓本應早於光緒。因為拓本與青布包裝匣分開，我們已無法分辨藏本中那些屬於這批六十八紙的舊拓。不過，我們的確發現一批拓片拓工極精，畫象極其清晰，榜題殘泐較少，遠較光緒本為佳，勞先生曾以紅筆在若干幅背側親筆批註，很可能即他所說的乾隆本。按乾隆五十一年黃小松訪得之初拓本甚佳，其後再監拓者榜題已有殘泐。^⑤再者，民國卅七年十一月，傅斯年曾轉贈本所武氏祠畫象拓片五十四張。加上來歷不明者多套，本所遂有此祠拓片精粗不等五、六種之多。其中同一石少則一幅，多則九幅。這是本

④ 勞先生兩信皆說沙畹本最好，應係記憶有誤。勞先生批註我所拓片時，多次注明我所拓片勝於沙畹本之處，請見《精選集》編按。我們在比對拓片時，發現不少我所拓片確實優於沙畹本，亦請參考《精選集》編按部分。

⑤ 方若著，王壯弘增補，《增補校碑隨筆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），頁150-151。

所漢畫拓本來歷較清楚的一例。其餘自收藏印及原封套可知，頗多來自膠西柯昌泗、山陰周星詒。還有很多一無題跋、收藏印或其它記錄，淵源已難追索。

這批材料到台灣後，存於傅斯年圖書館。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曾據屈萬里先生手訂的分類，經過初步整理，編有目錄。但是還有很多整包整包未曾拆封。民國七十九年，我為寫有關孔子見老子畫象的論文，到圖書館拓片室翻找材料，無意中見到一包包既未裱褙，也未編目的拓片。隨手拆閱若干，大開眼界。於是起意糾集同志，加以清理。然而時日遷延，直到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才成立了歷史圖象資料整理計劃，由蒲慕州先生主持。

民國八十四年文物圖象研究室成立，拓片整理成為研究室計劃的一部分。為更有效推進工作，佛教造像拓片整理交由顏娟英負責，漢畫部分初由蒲慕州，後由我承乏。參加拓片整理工作的所內外人員，先後有蒲慕州、顏娟英、劉增貴、林富士、賴鵬舉、王正華、李建民、黃銘崇、劉淑芬、陳昭容、李貞德、柯嘉豪（John H. Kieschnick）、呂敏（Marianne Bujard）、紀安諾（Enno Giele）等。

大家每星期工作一次，將尚待整理的各式拓片五十餘包，逐一拆開、定名登記、編目、裝裱。原包裝紙和紙上注記的資料加以保留。前後編目共約二千九百餘件，其中不少為漢以後者。漢畫部分整理的重點是找出原已有目錄及裝裱過的舊拓，再將凡同一石之新舊拓片分別集中，接著與既有的著錄如《漢代畫像全集》、《山東漢代畫像石選集》、《魯迅藏漢畫象》、《南陽漢畫象彙存》、《南陽漢代畫像石》等比對，一方面登記著錄情形，一方面比較、記錄各本優劣、尺寸、收藏印、題跋等。工作至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，終於將一千四百餘件，近七百種漢畫拓片比對查看一過。

在比對的同時，我們將各筆資料輸入電腦建檔。因為圖書館已有上萬拓片經過裱褙，並編號裝筒保存。為了管理上以及攝影上的需要，這些新打開的拓片也陸續裝裱。裝裱後擇最優者拍照。有時優劣互見，則就較勝部分，攝取多張，掃描建立電腦圖象檔。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》（以下簡稱《目錄》）、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》（以下簡稱《精選集》）即根據這些照片而成。其中武氏祠圖象檔已納入文物圖象研究室電腦網路資料庫，供大眾檢索使用。這兩書出版後，書中資料也將納入上述資料庫，在網路上開放，讀者可以全文檢索，或據圖檔編號查索。

《目錄》共收六百九十八種。每種附拓影及相關基本資料。《精選集》則是擇其較精者三十六種和未見發表者七十七種，共一百一十三種刊佈。除刊出原拓全形，有些也附局部放大。

拓本善惡在乎拓製先後、拓工精麤、拓本之殘缺或完整。以下僅舉三、四例，其餘讀者校讀諸本，自能判別。

《精選集》圖6，為武氏祠前石室第六石。《校碑隨筆》王壯弘增補云：「黃小松監拓本前石室第六石第七榜『功曹車』三字雖損尚存，後拓僅存『車』字少許」。^⑥容庚《漢武梁祠畫像考釋》於「功曹車」、「尉卿車」二榜云：「同治本泐前榜，今拓本復泐後榜」（頁27）。我所藏本有「功曹車」三字清晰完整者。又右端下方自橋奔下一騎，騎士頭部沙畹本已缺，我所拓本未殘（見頁2附圖）。圖7，前石室第七石榜題「王發」我所拓本未泐；圖8，前石室第八石「此秦王」榜題亦明晰完整。據王壯弘說，此皆「舊拓也」。除了榜題，這批藏本拓製精美，畫象上的陰刻線條纖毫畢露，遠遠超過已刊佈的中外圖錄。

此外，《精選集》圖17出山東嘉祥焦城村。沙畹（Éd. Chavannes）《北中國考古記—圖版篇》（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: planches, Paris, 1909, 圖151）、大村西崖《支那美術史雕塑篇》（圖209）、關野貞《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》（圖189）、傅惜華《漢代畫象全集》初編（圖162）、《魯迅藏漢畫象》（二輯，圖77、143，同一件誤為不同地所出之兩件）、朱錫祿《嘉祥漢畫象石》（圖3）皆曾著錄。此畫象上有重要的榜題「此齋主也」。本所拓本字劃清晰完整。自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誤釋為「此齊王也」，《金石索》、《漢代畫象全集》、《魯迅藏漢畫象》等皆沿襲其誤。《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》則作「此齋王也」，引出無數畫象解讀上的是非。^⑦此石從中斷裂為二，左半斷石之右下端缺一角。右半斷石之左上角大村、關野本不缺，但從拓片可知，拓製時此角已斷，裂痕清晰。沙畹本、傅本、魯迅本、朱本此角全缺。唯我所拓本乃在此角未斷前所製，無裂痕，時代最早，也最為完整。今原石已不知去向，拓本更為可貴。其餘未見著錄之本，選集中皆注明，不再贅言。

最後我要感謝所有曾參加工作的朋友，以及圖書館裡曾協助工作的人員，尤其是自始至終擔任助理的林明信先生。幾年來整理的準備工作以及最後目錄的編輯都由他擔任。沒有他的幫忙和大家的合作，這兩本書不可能出版。當然還要感謝前任所長管東貴、杜正勝和現任所長黃寬重先生。沒有他們的同意和支持，這項計劃不可能進行。

⑥ 同上，頁151。

⑦ 這些是非待信立祥而獲得釐清，參信立祥，〈論漢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畫象〉，《漢代畫像石研究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180-203。